

美以伊冲突对我国物价短期冲击和中长期潜在影响研究

吴立元

内容提要:我国物价水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低位运行,推动价格合理回升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近来,美以伊冲突对大宗商品价格与全球通胀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会沿着生产网络影响我国物价水平。本文构建包含进口中间投入、成本传导率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模拟分析美以伊冲突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我国 PPI 与 CPI 的短期与中长期影响。分析发现:美以伊冲突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确会对我国物价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有限,对 CPI 的影响显著小于 PPI。即使在相对极端情况下,美以伊冲突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仍然可控。基于此,本文从推动物价合理回升、提升应对大宗商品价格冲击韧性、缓解供给冲击不利福利影响等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美以伊冲突;大宗商品价格冲击;CPI;PPI

DOI:10.19851/j.cnki.CN11-1010/F.2026.05.143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志码:A

2026 年 2 月底以来,美以伊爆发军事冲突,多次破坏石油等工业设施,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到目前为止,虽然双方从密集的军事打击转为谈判,且多次声称将要达成协议,但冲突的未来进展仍充满不确定性。美以伊冲突对石油、化工材料等重要大宗商品价格产生了巨大冲击。油价短期飙升,大量基础化工材料价格也普遍大幅上涨,到目前仍大幅高于冲突前,全球通胀形势再次充满变数。

近年来,我国 CPI 增速持续低位运行,PPI 甚至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负增长。2025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 PPI 与 CPI 逐渐回升,但总体仍处于低位。2026 年 2 月以来,我国 PPI 增速显著抬升,CPI 增速也出现明显的上升迹象。那么,我国 PPI 与 CPI 的上升在多大程度上是美以伊冲突引起的?这一上升态势是短期现象还是将持续下去呢?如果美以伊冲突结束,我国物价水平是否会重回极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呢?如果出现极端情况,美以伊冲突升级,我国物价水平是否存在大幅上升的风险?作为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代表性问题,美以伊冲突短期内虽然将以阶段性协议的方式缓和,但以后仍可能反反复复,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会对价格和实际经济反复产生影

响。因此,地缘冲突给我国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近年来,由于全球供给冲击频发,研究供给冲击对物价影响的文献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已有研究从全球通胀成因、低通胀环境变化和输入型通胀应对等角度指出,疫情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供应链瓶颈及主要经济体政策调整,均可能强化外部价格冲击向国内物价的传导风险(谭小芬和王欣康,2022;彭文生等,2022;杜秦川,2022)。在方法上,相关文献主要采用 VAR 模型、投入产出模型、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等分析供给冲击对物价的影响。

(一) 基于 VAR 模型的研究

一些文献采用基本的 VAR 模型及各种变体讨论供给冲击对通胀的影响。王永中和钱胜存(2025)用 TVP-VAR 模型(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 PPI 和 CPI 的影响,发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对我国 PPI 的影响稳步提升,对 CPI 的影响先增强后减弱,呈现明显的时变效应。Chen 等(2020)采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实验室综合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4SYZH00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研究”(2024MZD026)。

作者简介:吴立元(1990-),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通胀与货币政策。

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 (TVP-SVAR-SV), 将油价波动的结构性冲击分解为石油供给冲击、全球需求冲击、国内需求冲击以及石油特定需求冲击四种类型, 利用 1999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的月度数据, 分析这些油价冲击对我国进口、生产和消费三个阶段通胀的时变影响。研究表明: 四种油价冲击对我国各阶段通胀的传导效应均具有时变性, 且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和具体时点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整个样本期间, 由石油特定需求冲击引发的油价上涨, 是我国进口和生产阶段通胀压力产生的最重要成因, 而我国消费阶段的通胀压力则主要受国内需求冲击的影响。Neri 等 (2023) 用 TVP-VAR 模型分析了能源价格冲击对欧元区通胀的影响, 发现能源价格冲击对通胀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在 2022 年第四季度, 能源价格冲击对整体通胀 (headline inflation) 的贡献率约为 60%; 而对核心通胀 (core inflation) 的贡献率则在 20%~50% 之间。而且,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能源价格向核心通胀的传导 (pass-through) 有所增强。文章还用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讨论能源价格冲击对欧元区通胀的影响, 弥补了 TVP-VAR 模型的一个缺点, 即难以分析通胀与实际经济的关系, 因而难以揭示能源价格冲击可能导致实际经济的变化, 进而影响通胀。Diaz 等 (2024) 用 SVAR 模型分析了 1998—2022 年间, 全球供应链中断和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通胀率的影响变化。研究发现: 自 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以来, 供给冲击已成为通胀的主要驱动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后, 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显著影响了德国、英国和美国的通胀, 而在新冠疫情暴发后, 全球供应链中断对这四个国家通胀的影响则急剧上升。Bańbura 等 (2023) 利用结构性贝叶斯向量自回归 (Bayesian VAR) 模型, 分析了各类供给冲击对通胀的影响。研究发现: 与过去相比, 与全球供应链和天然气价格相关的冲击影响显著增大, 供给冲击可以解释后疫情时代通胀飙升的绝大部分。

(二)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

倪红福等 (2018) 构建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效应模型, 并利用 2014 年全球投入产出表 (WIOT) 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的价格效应。研究发现, 现行关税体系对我国行业价格的影响大于美国。但中美加征关税, 将使得美国的价格水平提高幅度大于中国, 美国居民的福利损失总体上大于中国。Giovanni 等 (2022) 通过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新冠疫情对欧元区通胀的影响, 并将其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在 2020—2021 年的经历进行对比。研究发现: 消费结构从服务向商品的转变, 通过全球投入产出联系被放大, 从

而影响了贸易和通胀, 特定行业的劳动力短缺会导致更高的通胀。在解释 2020—2021 年欧元区通胀时, 外国冲击和全球供应链瓶颈所起的作用, 远大于国内总需求冲击。Comin 等 (2023) 构建了一个包含投入产出联系的开放经济新凯恩斯主义框架, 评估潜在的产能约束及其冲击对通胀的影响。研究表明: 国内外生产商面临的约束会使国内和进口价格的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 其效果类似于加价冲击 (markup shock)。在 2021—2022 年期间, 产能约束解释了美国通胀上升幅度的一半。2021 年的产能紧约束放大了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 助推了通胀的起飞。

实际上, 各种研究方法各有利弊。基于 VAR 模型的研究为数据驱动, 能较好捕捉冲击的短期影响, 不依赖严格的经济学假设, 但较为黑箱, 不利于分析冲击传导机制, 且结论高度依赖于样本数据的历史特征。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考虑了通胀预期与经济增长缺口, 而且能分析非线性影响, 可以与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但其稳定性受到很大质疑, 准确估计相当困难。投入产出价格模型能清楚地分析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沿着生产网络的传导、产业链对进口价格冲击的放大潜力, 对评估通胀风险有较大优势, 但其依赖于一系列假设, 准确性受到很大影响。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结合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与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思想构建分析框架, 模拟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我国 PPI 与 CPI 的短期与中长期影响。

二、外部冲突对物价短期和中长期影响的理论分析

从理论层面看, 供给冲击对通胀的影响一直是货币政策理论中激烈争论的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 石油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供给冲击频发, 美欧等主要工业化国家通胀大幅飙升, 且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当时, 供给冲击导致通胀上升的观点非常流行, 货币主义观点尚未得到经济学界与央行的高度重视。甚至连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恩斯也认为, 美联储不应该对控制这种供给推动型通胀负主要责任, 政府与财政部采取供给侧政策才是控制此类通胀的关键。然而, 美国实施的价格管制、财政紧缩等政策并没有奏效。后来, 正是沃尔克的极端紧缩货币政策结束了这场历史大通胀, 通胀的货币主义理论开始被广泛接受。新冠疫情后, 美欧再次爆发高通胀, 美联储与欧央行采取较为坚决的货币紧缩,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 供给冲击引发通胀上升的观点并没有被证伪。如图 1 所示, 大约与美以伊冲突同步, 我国 PPI 与 CPI 均出现明显上升, 引发了人们对输入性通胀压力的关注, 再次表明供给冲击对物价影响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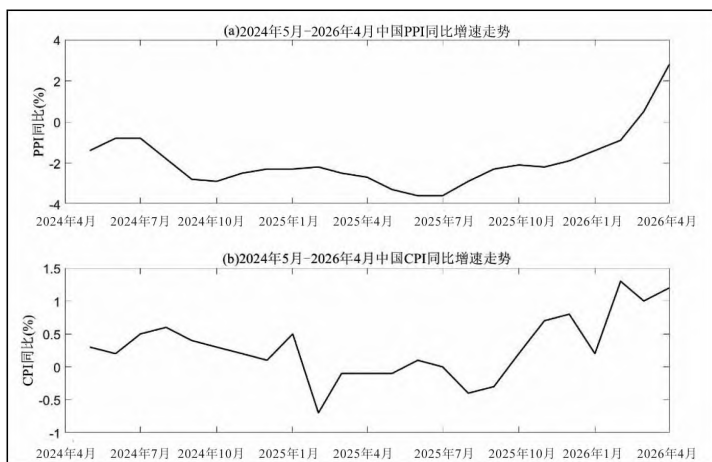


图1 2024年5月—2026年4月我国PPI与CPI增速走势

作为一种典型的供给冲击,外部冲突对物价的影响有多方面的理论渠道,这里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进行分析。短期内,产业链难以调整,通胀预期还存在较大粘性,对实际经济的影响还没有充分显现,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充分调整,外部冲突对物价的影响主要是成本渠道,即通过影响进口产品价格,沿着生产网络影响各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从而改变物价水平。但是,特别重要的是:这种成本传导与生产贸易结构密切相关。大宗商品价格冲击首先影响直接进口产品相关行业的成本与价格,进而通过行业间投入产出联系间接影响其他行业的成本与价格。

在长期,外部冲突对物价的影响机制变得相当复杂,除了短期的生产网络成本传导渠道外,还存在其他重要渠道。首先,产业链会发生调整。面对价格冲击,企业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会主动应对,例如通过改变采购来源、优化成本构成、提升技术水平等,减少对高价格外部进口品的依赖。其次,通胀预期渠道开始发挥作用。人们对通胀的预期通常取决于过去一段时间的通胀记忆。当通胀刚开始上升时,人们还习惯于过去的低通胀状态,预期存在较大的惯性。但当通胀上升持续一段时间,人们就会调整预期,进而导致产品价格、工资的调整,从而影响PPI与CPI。最后,外部冲突对实际经济的影响成为重要渠道。外部冲突带来的冲击会导致经济波动,并显著影响总需求,特别是就业与投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反过来影响物价水平。从长期来看,经济周期成为影响物价走势的关键因素。对我国来说,外部冲突对实际经济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大宗商品涨价未必完全是不利冲击。我国虽然进口大量的石油与化工原材料,但同时也生产并出口大量的石化与化学制品。两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从而大幅缓解外部冲击。此外,在长期,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物价水平十分重要的变量。如果通胀发生较大波动,央行会采取政策稳定通胀,成为通胀的最终决定力

量,而央行的政策又取决于经济周期与通胀波动程度。

总之,在长期,外部冲击对物价的影响相当复杂。特别重要的是:可以在给定货币政策、经济影响等因素的情况下,评估外部冲击对我国物价水平的潜在影响,这正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三、美以伊冲突对我国物价短期冲击和中长期潜在影响的分析框架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进口、投入品价格传导率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模拟分析美以伊冲突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本文首先介绍基础框架,并用来分析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短期影响,然后对该模型进行拓展,用来分析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中长期影响。

(一) 投入产出价格模型

根据投入产出表的列平衡关系,即总投入等于总产出可得:

$$p_j^d x_j = \sum_{i=1}^n p_i^d a_{ij}^d x_j + \sum_{k=1}^n p_k^m a_{kj}^m x_j + V_j \quad (1)$$

其中, p_j^d 和 x_j 分别表示国内行业 j 的价格和产出; p_k^m 表示进口行业 k 产品的价格; a_{ij}^d 表示行业 j 使用国内行业 i 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 a_{kj}^m 表示行业 j 使用进口行业 k 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 V_j 表示行业 i 的增加值。两边同时除以行业产出得:

$$p_j^d = \sum_{i=1}^n p_i^d a_{ij}^d + \sum_{k=1}^n p_k^m a_{kj}^m + v_j \quad (2)$$

其中, $v_j = V_j / x_j$ 表示单位产值的增加值(下文称为增加值率)。

参考王勇等(2022)的研究,引入成本传导率 θ_j ,刻画从成本向价格的传导程度,得到:

$$p_j = \theta_j \left(\sum_{i=1}^n p_i^d a_{ij}^d + \sum_{k=1}^n p_k^m a_{kj}^m + v_j \right) \quad (3)$$

写成矩阵形式:

$$p^d = \Theta \left[(A^d)^T p^d + (A^m)^T p^m + v \right] \quad (4)$$

其中, $\Theta = \text{diag}(\theta_j)$; A^d 为国内投入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元素为 α_{ij}^d ; A^m 为进口投入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元素为 α_{ij}^m ; v 为各行业的增加值率向量。求解出国内各行业价格变动向量得:

$$p^d = \left(I - \Theta (A^d)^T \right)^{-1} \Theta \left[(A^m)^T p^m + v \right] \quad (5)$$

全微分并整理得到:

$$\Delta p^d = L^d \Theta (A^m)^T \Delta p^m + L^d \Theta \Delta v \quad (6)$$

其中, $L^d = \left(I - \Theta (A^d)^T \right)^{-1}$ 为考虑成本传导率的

里昂惕夫逆矩阵。

由此可以看出,各行业产品价格受进口价格、增加值率变化、成本传导率以及生产网络结构的影响。得到各行业价格变动后,只要确定各行业产品在PPI与CPI中的权重,便可计算出PPI与CPI变动。

在短期,我们假设产业链结构不发生变化、要素价格与增加值率也不发生变化、价格部分传导、宏观经济政策不做出调整,仅考虑进口大宗商品价格冲击通过投入产出联系对国内各行业价格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通过(6)式求出各行业价格的变动,然后用PPI与CPI权重加权求出PPI与CPI的变动分别为:

$$\Delta PPI = \sum_{k=1}^N \omega_k^{PPI} p_k^d \quad (7)$$

$$\Delta CPI = \sum_{k=1}^N \omega_k^{CPI} p_k^d \quad (8)$$

(二) 参数估计

本文需要估计的参数包括国内投入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进口投入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PPI与CPI权重、成本传导率等。这里具体说明如下:

1.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由于本文研究进口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影响,需要知道各行业使用的进口投入,因此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3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来计算国内投入与进口投入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2.PPI权重。由于我国PPI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权重确定方法,我们用各工业行业产值占工业行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PPI的权重^①。

3.CPI权重。CPI为城乡居民最终消费的价格指数。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中,只有总消费支出的数据,没有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数据。因此,我们将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对应到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行业中,然后求出每个行业的居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作为该行业在CPI中的权重。

4.成本传导率。从理论上讲,成本不完全传导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如垄断势力、价格粘性等。垄断势力对成本传导的影响难以定量估计,这里考虑价格粘性。文献估计表明:当发生成本变化时,企业未必会立刻调整价格。企业调价周期大约分布在半年到一年,这里取一个中间值,即9个月。我们设定短期时间期限为半年,那么价格调整程度为2/3,这也与倪红福和闫冰倩

(2021)考虑的中性情形一致。

四、美以伊冲突对我国物价短期冲击结果分析

这部分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美以伊冲突对我国物价水平的短期影响。美以伊冲突直接大幅推高了能源、化工产品等的价格,我国各行业需要大量进口这些大宗商品,因此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会沿着生产链传导到我国PPI与CPI。我们分析了石油、煤炭、天然气、化工材料、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各类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在冲突前后的变化,发现石油与化工材料受本次冲突影响最为直接显著^②。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美以伊冲突下石油与化工材料价格的变动,然后通过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测算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我国PPI与CPI的短期影响,并分析影响机制。

(一) 美以伊冲突下石油、化工材料的价格变动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石油、甲醇、乙烯等能源与化工材料产品价格普遍大幅上涨,这里通过现实数据分析相关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幅度。图2展示了原油和对二甲苯、苯乙烯、甲醇、乙烯、丙烷、环氧乙烷等6种重要的化工材料在冲突爆发前后价格的变化。我们选取冲突爆发前十二周的平均价格与冲突爆发后十二周的平均价格。其中,原油采用NYMEX轻质原油活跃期货合约价格,对二甲苯、苯乙烯、甲醇均采用活跃期货合约价格,乙醇采用日本现货离岸中间价,丙烷、环氧乙烷采用中国现货价格,价格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③。从图2可以看出,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后,原油价格平均上涨了60%,从冲突前的约60美元上涨到96美元。对二甲苯等化工材料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涨幅在30%~80%不等。可见,这次冲突的确带来了较大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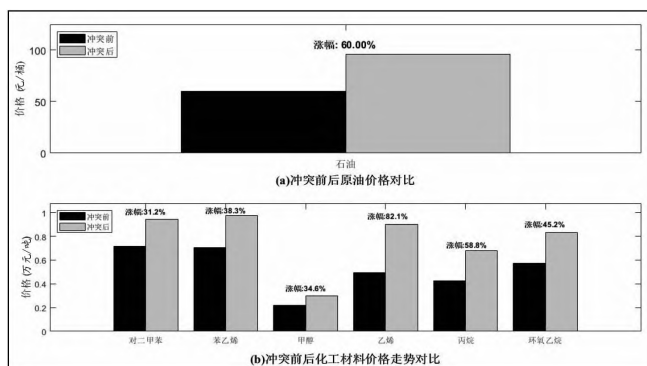


图2 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

①注释: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说明,PPI调查分类及主要产品目录(简称调查目录)包含了41个工业行业大类(实际调查40个工业行业大类),207个工业行业中类,666个工业行业小类,1310个基本分类,小类及以上分类的权数资料来源于工业统计中分行业销售产值数据资料。

②注释:我国煤炭价格在2025年底已经开始探底回升,主要因素可能在于库存周期、产能政策等方面,各城市消费端天然气价格总体稳定。铜、金、银等有色金属价格也早在冲突前已经大幅上涨,冲突后甚至出现大幅回调。农产品价格受冲突影响相对较小。

③注释:容易验证,对不同类型的价格,价格变动幅度相当接近。

(二) 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我国 PPI 与 CPI 的短期影响

我们通过模拟不同冲击大小组合的影响分析 PPI 与 CPI 对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敏感性。表 1 和表 2 分别展示了不同石油价格与化工材料价格冲击组合下 PPI 与 CPI 的变动幅度。可以看出,基准情形下,即油价上涨 60%,化工材料价格统一上涨 20%,PPI 将上升 1.21 个百分点,CPI 将上升 0.45 个百分点^①。按照冲突爆发前物价水平,2026 年我国 PPI 中枢将上升到 2%左右,CPI 中枢将上升到 1.3%左右。即使考虑相当激进的情形,即油价上涨 100% (稳定在 120 美元),化工材料价格统一上涨 40%,PPI 将上升 2.04 个百分点,CPI 将上升 0.76 个百分点。按照冲突爆发前物价水平,2026 年我国 PPI 中枢将上升到 2.9%左右,CPI 中枢将上升到 1.6%左右。这一模拟结果表明:美以伊冲突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确会通过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对 PPI 和 CPI 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大。即使出现较为极端的情形,对我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也是显著可控的。

表 1 不同石油价格与化工材料价格冲击组合下 PPI 的变化

价格组合	化工材料上涨	化工材料上涨	化工材料上涨
	20%	30%	40%
油价上涨 60%	1.21%	1.24%	1.27%
油价上涨 80%	1.59%	1.62%	1.66%
油价上涨 100%	1.97%	2.00%	2.04%

表 2 不同石油价格与化工材料价格冲击组合下 CPI 的变化

价格组合	化工材料上涨	化工材料上涨	化工材料上涨
	20%	30%	40%
油价上涨 60%	0.45%	0.47%	0.48%
油价上涨 80%	0.59%	0.60%	0.62%
油价上涨 100%	0.73%	0.74%	0.76%

我们可以分解出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物价的多轮拉动效应,具体来说,国内物价变动满足:

$$\Delta p^d = \Theta(A^m)^T \Delta p^m + \Theta(A^d)^T \Theta(A^m)^T \Delta p^m + \left(\Theta(A^d)^T \right)^2 \Theta(A^m)^T \Delta p^m + \dots \quad (9)$$

上式中每一项对应一轮拉动效应。图 3 展示了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 PPI 与 CPI 的多轮拉动效应分解,其中横轴数字代表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以此类推。可以看出,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 PPI 与 CPI 的影响衰减速度非常快,主要是第一轮和第二轮拉动效应,后面很快衰减至接近零。第一轮拉动效应是指各行业直接进口石油与化学原料作为投入品而产生的涨价效应;第二轮拉动效应是指这些产品涨价后作为各行业投入品,进而再次导致各行业

产品涨价的效应。从模拟结果可知,前两轮拉动效应解释了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沿生产网络传导的绝大部分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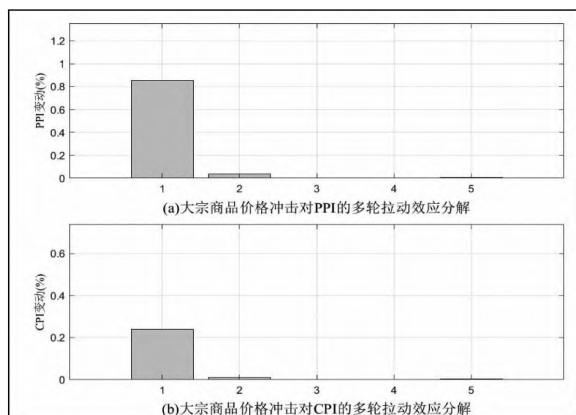


图 3 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我国 PPI 与 CPI 的多轮拉动效应

五、美以伊冲突对我国物价中长期潜在影响结果分析

在中长期,价格、产业链、政策等都会发生比较充分的调整,冲击的影响将不同于短期。由于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准确估计冲击的长期影响非常困难。这里尝试探究冲击对价格影响效应的一些重要因素,并在此框架下对冲击的中长期影响做出初步估计,同时与短期影响进行比较。长期影响高度依赖于美以伊冲突的未来发展态势,因而需要对未来事态做出推测。总体来说,有三种典型情形:一是乐观情形,即短期内美以伊能够妥善解决重要矛盾,达成和平协议,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再爆发冲突。考虑到美以伊矛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这种情况的概率相对较小。二是中性情形,即美以伊达成暂时性协议,在各方都妥协的情况下解决部分关键问题,但由于遗留问题的存在,在未来不长时间仍可能再次爆发冲突,这种情形的概率可能最高。三是悲观情形,即美以伊难以达成协议,冲突继续升级。目前,美国显然没有能力在短期较小代价下实现自己所有的战略目标,伊朗也有通过谈判解决矛盾的意愿,在各方劝和促谈努力下,这种悲观情形的概率更小。在乐观情形下,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会逐渐衰减,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也会快速下降,因而这里不再详细分析,重点分析冲突持续扰动的情形。

与短期影响分析相比,在分析冲击的长期影响时,本文重点考虑四个方面的变化^②。

①注释: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没有考虑我国对成品油价格的调控机制,如果考虑这种机制,对 CPI 的影响将显著降低。同时,这里假设的化工材料价格上涨幅度不仅限于此处列出的 6 种。

②注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游能源价格水平之间存在一定联动,如果中长期原油价格维持高位,可能会带动天然气、煤炭等其他形式的能源涨价,从上游能源端形成比较强的价格上涨合力,因此考虑煤炭、天然气等价格长期反应的影响能更全面准确地估计美以伊冲突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但是,这里考虑到煤炭主要影响到电力价格,而我国电力价格相对稳定,能源持续转型也在逐步熨平煤炭价格波动,这一影响相对较小。

第一,价格传导更加充分。本文引入随时间变化的价格传导率 $\theta(t)$ 。大量文献表明,由于合同、调价成本、竞争、信息不完全等原因,价格传导存在粘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将逐渐调整。以往文献中对企业调价周期进行了大量估计,普遍发现企业调价周期大约为半年到1年,新凯恩斯文献中普遍采用1年的假设。参考这些文献,我们假设1年内,成本传导率 $\theta(t)$ 将上升到1。

第二,产业链会对价格做出反应。在短期,产业链难以快速调整,企业依然会保持原来的采购结构;在长期,企业将通过重新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减少对价格较高的产品的依赖,增加对价格较低产品的需求。政府也会通过各种政策调整产业链,努力规避价格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减少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口大宗商品的依赖,进口可能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国内不断推进新能源转型将继续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为了刻画产业链的调整,我们假设对涨价大宗商品的进口敞口在6个月内不变,此后逐渐下降,两年内下降20%,达到均衡水平,受到要素互补性、资源分布限制等的制约难以再进一步下降。

第三,通胀预期可能显著抬升。研究表明:人们的通胀预期形成机制往往是适应性预期模式,即取决于过去一段时间的通胀水平。短期价格冲击往往不会显著改变通胀预期,因为人们仍然习惯于过去的低通胀。但当冲击持续时间较长时,人们便会预期通胀将会持续上升,即改变通胀预期。

第四,增加值率发生变化。在短期分析中,我们假设行业增加值率不变。但如果价格持续上升,增加值率可能发生变化,这实际上反映了供给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投入品价格上升会显著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导致企业减少投资与劳动力扩张,甚至导致失业率上升。结果是:投入品在成本中所占的比率上升,而增加值则有所下降。在长期分析中,我们假设增加值率在6个月内不发生变化,此后下降5%。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四方面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三因素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主要构成,即通胀是通胀预期、经济状况与供给冲击的函数。基于这些分析,我们将短期分析动态化。

$$\Delta \pi_t = \Delta \pi_t^e + L_t^d \Theta_t \Delta v + \Delta u_t \quad (10)$$

其中, $\Delta \pi_t$ 为通胀水平,可以代表 PPI 或 CPI 相对于冲突前均衡水平的变动; Δu_t 为直接的供给冲击,我们用上述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来估计^①; π_t^e 由过去12个月的通胀水平来决定。

利用上述简单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我们可以模拟出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 PPI 与 CPI 的动态影响,从而分析冲击的长期影响。我们考虑两种具体情形:

一是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有所减弱,但仍高于冲突爆发前,这里设定油价上涨30%,化学材料价格上涨15%的情形;二是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增加到极端情形,这里设定油价上涨100%,化学材料价格上涨40%的情形。其中,前者为最可能发生的情形,后者为值得关注的最坏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中,假定上述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持续6个月,并在此后18个月均匀递减到0,即两年内回到没有冲突的均衡水平。我们模拟出冲突爆发后24个月的价格变动,结果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我国 PPI 与 CPI 的动态影响均呈现先上升后衰减的特征。相比之下,对 PPI 的影响持续时间更长,对 CPI 的影响衰减较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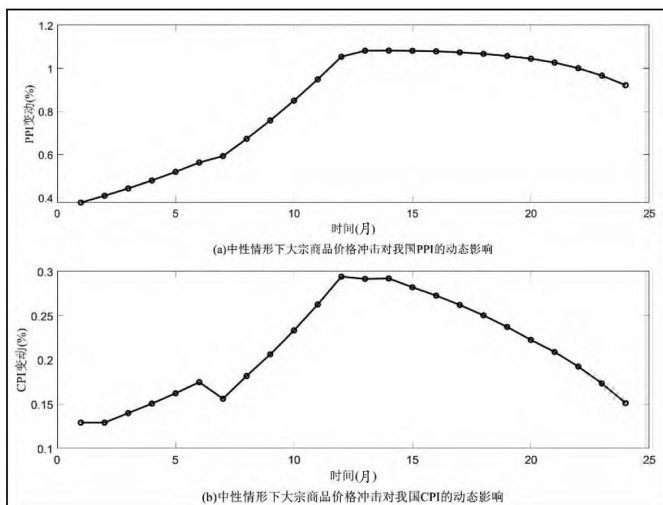


图4 中性情形下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我国 PPI 与 CPI 的中长期影响效应

在第二种情形中,假定上述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持续12个月,并在此后12个月均匀递减到0,即两年内回到没有冲突的均衡水平。模拟结果如图5所示。由此可以看出,极端情形与上述中性情形总体特征是类似的,但有两方面的显著差异:第一,极端情形下,持续性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长期影响大幅高于中性情形。PPI 平均水平可能上升到5%以上,CPI 平均水平可能上升到2%。第二,影响的持续性显著增加。考虑到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非常小,因而总体风险并不大。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如果通胀出现超预期现象,重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可能成为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影响的关键决定因素。大量观察与历史经验表明: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的影响显著高于中国。因此,如果价格冲击较大,这些经济体很可能率先紧缩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的压力,总需求更可能成为重要力量。同时,我国货币政策也会做出相应调整,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结合本文测

①注释:即第四部分短期分析方法,并考虑到成本传导率的变化与产业链调整。

算结果与货币政策的可能反应,我国输入性通胀的向上风险依然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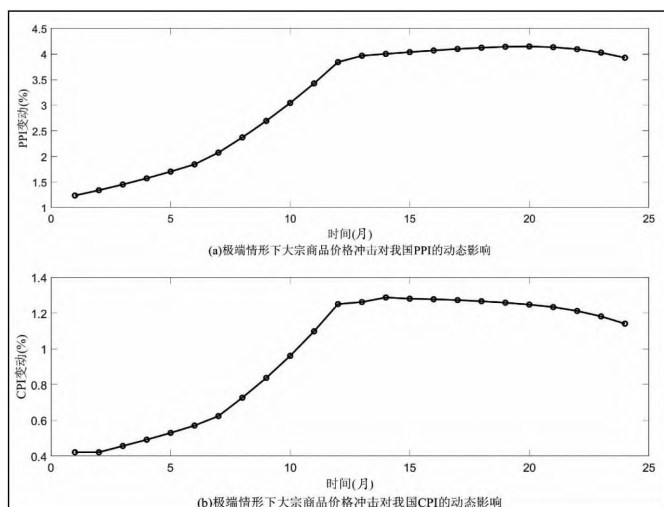


图5 极端情形下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我国PPI与CPI的中长期影响效应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拓展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模拟分析了美以伊冲突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中国物价水平的短期与中长期潜在影响,评估了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下我国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分析表明:本轮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确会对我国物价水平产生较为显著的短期影响,但程度相当有限。在长期,只有出现比较极端的情形,即美以伊冲突持续升级,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且持续较长时间,才会对我国产生较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且这种影响仍在合理范围内。目前,总需求不足与结构性因素仍制约着我国物价水平的回升(倪红福等,2025)。在当前我国物价形势下,扭转通胀低位运行、推动物价合理回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应对外部供给冲击的能力,防范输入性通胀大幅上升风险。面对美以伊冲突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及其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1. 充分利用温和通胀预期,推动物价持续合理回升。一方面,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着力促进总需求。研究表明: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胀的影响比较有限,特别是对消费者价格指数影响更小,总需求仍是推动物价回升的主要因素。因此,央行宜在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框架下,更加重视物价稳定,充分发挥物价与总需求稳定对金融稳定的重要促进作用,构建更加畅通的与市场沟通机制,引导物价增速向目标靠近。尽快完善以稳定通胀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目标框架与以简单规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明确宣布合适的通胀目标,根据规则持续宽松货币政策、着力扩张总需求直到实现通胀目标。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物价上升预期,继续推动反“内卷式”竞争。我国实施的反“内卷”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原来更倾向于是一种不利冲击,会在一

定程度上推高通胀预期,企业存在涨价压力与动力。在此背景下,充分利用这种通胀预期,继续推进反“内卷”,避免再次陷入“价格上升—‘内卷’竞争—价格下降—企业无利可图”的循环,推动物价健康回升。

2. 健全大宗商品管理机制,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构建多元化战略储备体系,建立以国家储备为核心、商业储备为补充、企业库存为基础的三级储备机制,重点扩大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粮食等关键品种的储备规模。拓展进口来源渠道,推动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资源富集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合作关系,降低对单一来源地的过度依赖。完善价格风险对冲机制,扩大期货市场开放,丰富大宗商品期货品种,鼓励实体企业运用期货、期权等工具套期保值。充分发挥我国新能源相关技术领先优势,继续大力推动能源绿色转型。

3. 完善输入型通胀安全网,缓解对薄弱群体冲击。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总体物价的影响相当有限,但对部分薄弱群体的影响可能较大,值得重视。为有效对冲供给冲击通胀带来的财富再分配风险,特别是其中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及固定收入者的“隐形税收”效应,建议构建“精准补贴、稳定就业、引导预期”的三支柱政策缓冲体系。针对脆弱群体,建立“价格—收入”精准补贴机制。对受上游成本冲击最严重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实施定向的阶段性税费缓缴与社保费减免政策。加强对大宗商品、初级产品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确保价格信号真实反映供求关系,防止通胀预期自我实现与放大。

参考文献:

- [1] 谭小芬,王欣康.“大流行”后的全球通胀:成因、风险与中国应对[J].国际金融,2022(7):3-16.
- [2] 彭文生,管涛,朱海斌.全球低通胀环境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 [J].国际经济评论,2022(2):9-17.
- [3] 杜泰川.高度关注,提早应对全球通胀压力新变化[J].宏观经济管理,2022(7):6-13.
- [4] 王永中,钱胜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PPI和CPI的影响研究——基于TVP-VAR模型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1):28-35+71.
- [5] 倪红福,裴六堂,陈湘杰.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税成本效应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价格效应和福利效应[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8):74-90.
- [6] 王勇,黄宇轩,韩博昱.生产网络与垂直结构研究进展[J].经济动态,2022(3):123-138.
- [7] 倪红福,同冰倩.减税降费的价格和福利效应——引入成本传导率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分析[J].金融研究,2021(2):38-55.
- [8] 倪红福,韩登清,吴立元.经济结构视角下中外CPI走势分化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10):35-43.
- [9] Chen J, Zhu X, Li H. The pass-through effects of oil price shocks on China's inflation: a time-varying analysis[J]. Energy Economics, 2020, 86: 104695.
- [10] Neri S, Busetti F, Conflitti C, et al. Energy price shocks and inflation in the euro area [J/OL]. Bank of Italy Occasional Paper, 2023(792).
- [11] Diaz E M, Cunado J, de Gracia F P. Global drivers of inflation: The role of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commodity price shocks[J]. Economic Modelling, 2024, 140: 106860.
- [12] Bañbura M, Boleica E, Martínez Hernández C. What drives core inflation? The role of supply shocks[M]. ECB Working Paper, 2023.
- [13] Juliandi Giovanni, Kalemli-Özcan S, Silva A, et al. Global Supply Chain Pressure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flation[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2022.
- [14] Comin D A, Johnson R C, Jones C J. Supply chain constraints and inflation[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英文翻译详见第293页)

(吴立元英文翻译)

Research on the Short-Term Shocks and Medium-to-Long-Term Potential Impacts of the US-Israel-Iran Conflict on China's Prices

WU Liyuan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China's price level has remained persistently low for an extended period, and promoting a reasonable price recovery has become a key priority in China'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Recently, the US-Israel-Iran conflict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mmodity prices and global inflation dynamics. Commodity price shocks propagate through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affect China's price leve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put-output price model incorporating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cost pass-through rates to simulate and analyze the short-term and medium-to-long-term impacts of commodity price shocks caused by the US-Israel-Iran conflict on China's PPI and CPI.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commodity price shocks arising from the conflict do indeed exert a relative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prices, but the magnitude remains limited, with the impact on CPI being notably smaller than on PPI. Even under relatively extreme scenarios, the impact of the conflict on China's price level remains controllabl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moting reasonable price recovery, enhancing resilience to commodity price shocks, and mitigating the adverse welfare effects of supply shocks.

Keywords: US-Israel-Iran conflict; commodity price shocks; CPI; PPI

(王宏伟英文翻译)

Thought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for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ANG Hongwei¹ HOU Wanyue² and YANG Shuqi²

(1.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2.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both a critical window for China to comprehensively advance high-level self-reliance and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strategic phase for its transition from a major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house.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accumulated advantages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ssesses the overall trends of fu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pproach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realistic constraints and key tasks. The study finds that fu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ll exhibit several major trends: the paradig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will shift from disciplinary segmentation to systematic breakthroughs empowered by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will move from single-point breakthroughs to collective breakthroughs driven by chain-based integration; demand traction and scenario-based validation will reshape innovation pathways;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ill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s. Facing the goal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house by 2035,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should take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as the main line; strengthen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build an autonomous and controllable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o unleash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gradient cultivation and full-cycle support system for enterprises to reinforce their role as innovation entities;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industrial innovation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dvanc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to foster a virt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relia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ependent talent cultivation; and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up and cooperation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for allocating global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shaping international rules. These efforts will provide sustained momentum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he 15th Five-Year Pl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house; high-lev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郭冠男英文翻译)

Theoretical, Logic,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inese Path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GUO Guannan and LAN Minghui

(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System and Management, Chinese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100035)

Abstract: Digital service trade constitutes the core component of digital trade and is a key growth driver for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trade volume and optimizing trade structure. Promoting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building a strong trading n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theoretical logical framework of factor reconfiguration, structural evolution,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value multiplication. It examines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s of global digital service trade in terms of scale, structure, pattern, technology, and rules. It deeply analyzes the typic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econom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Singapore. It objectively assesses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and current challenges of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global digital service trade exhibits characteristics of resilient growth, value chain upgrading,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I empowerment, and barrier escalation.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has steadily expanded in scale and continuously increased trade surplus, but still faces shortcoming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mpetitiveness level, low-end locking of trade structure,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of policy support systems, and poor alignment between data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Based on this, it is suggested to build a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policy system led by institutional openness, centered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supported by coordinated policies, with rule participation as a breakthrough, and grounded in securi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trading nation.

Keywords: digital service trade; digital trade; strong trading n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